·XXXX·
DOI:10.20004/j.cnki.ujn.XXXX.XX.001

新大众文艺背景下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的张力与调适

吴布林　李佳艺

[摘　要]新大众文艺背景下,党在文化领域的领导能力结构和决策执行场域存在多重张力,即文艺生产去中心化、文艺创作工具理性化、文艺传播情境散点化、文艺生态商业化与加强党的思想引领力、文化创新力、国际传播力、风险防控力之间的张力。为巩固和发展党的文化领导权,应进一步培养价值主体,确立价值融入文艺生产的系统化生产体系;适配数字媒介,筑牢文艺工作高质量发展的人才支撑体系;拓宽战略视野,提升文艺叙事生态共生化的文化传播体系;推动协同共治,加快构建以负责任为核心的文艺产业生态,确保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繁荣发展。

[关键词]新大众文艺;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结构张力;能力调适

一、引言

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文艺战线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战线。2024年5月,《延河》杂志提出“新大众文艺”概念,引发了学界持续而热烈的争鸣。新大众文艺是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力的文艺新形态,强调文化创作的大众性,即“万众皆可创作”的文化生态,深刻重塑着我国文化发展的结构与路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与《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均强调,要“广泛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①,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完善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最新战略研判与工作部署,明确了智能时代广泛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的关键场域。

党的文化领导权作为确保我国文化高质量发展、保持先进属性的根本政治保证,决定着新大众文艺发展的性质、道路、前途和效果。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提出“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强调“守正,守的是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守的是‘两个结合’的根本要求,守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和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②,揭示了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根本保证。新时代“文艺工作的对象、方式、手段、机制都出

[基金项目]国家民委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民族地区高校‘大思政课’思政功能拓展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025-GMJ-307);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数字社会意识形态风险防控研究”(项目编号:21XKS030)。

[作者简介]吴布林,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李佳艺,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邮箱:2381314465@qq.com。

①《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人民日报》,2025年10月29日第1版。

②《二十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4年版,第462页。

现了许多新情况、新特点……对新的文艺形态,我们还缺乏有效的管理方式方法”①。在此背景下,新大众文艺对社会主义文化的生态重塑,对党在文化领域的领导能力结构与决策执行场域提出了全新要求。

二、新大众文艺背景下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的内涵实质与基本特征

新大众文艺发轫于数字技术与大众文艺的融合交汇,是契合高质量发展的先进文化形态。在新大众文艺背景下,党的文化领导权的内涵实质可以从数智时代党的文化领导能力建设基本规律中抽象出来,其基本特征呈现为坚持以人民群众为中心、领导范围的全域覆盖、运行结构的数字化。

(一)新大众文艺背景下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的内涵实质

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其内涵经历了从“共产主义思想去领导”到“党的文化领导权”,体现了党的领导在文化建设中的生动实践,凸显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的战略性价值。

第一,新大众文艺背景下的党的文化领导权是党的领导在文艺领域的体现。我们党历来重视文艺工作,将文艺事业视为党的重要事业,将文艺战线视为党的重要工作战线。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对出版工作提出了要求,强调“不论中央或地方出版的一切出版物,其出版工作均应受党员的领导”②。改革开放后,面对我国出现的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错误思潮,邓小平强调,“必须大力加强党对思想战线的领导”③。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提出“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④。历史和现实充分证明,无产阶级思想文化对社会实践活动产生引领作用的前提不仅取决于该思想文化自身的先进性,还取决于掌握这种先进思想文化的无产阶级政治组织对文化力量的领导权⑤。新大众文艺作为数字时代特有的文化形态,是在文化建设领域坚持党的领导的重要场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必然选择。

第二,新大众文艺背景下的党的文化领导权表明了文艺工作鲜明的政治属性。回顾党的百余年奋斗史,文艺作为上层建筑,具有一定的历史性和阶级性。追本溯源,“党的文化领导权”这一命题源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党领导人民对“中国向何处去”的回应。毛泽东曾言,“共产党是要左手拿宣传单,右手拿枪弹,才可以打倒敌人的”⑥,强调“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⑦。新大众文艺作为互联网时代的产物,其担负着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增强人民群众对党和国家认同、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等重要使命。因此,新大众文艺背景下党的文化领导权是党通过掌握先进文化的引导权、先进文化的解释权、消极文化的批判权、先进文化产品的生产权⑧,使上层建筑服务于经济基础发展,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重要力量。

---

①《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117页。

②《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页。

③《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5页。

④《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第68页。

⑤束锦:《毛泽东开启党的文化领导权的历史考察与现实启示》,《马克思主义研究》,2025年第12期。

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5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37页。

⑦《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4页。

⑧刘须宽:《党的文化领导权的本质内涵、面临挑战及其新时代建构路径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2025年第1期。

第三，新大众文艺背景下党的文化领导权实质上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在文艺领域的要求。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着人们文化生产生活格局，不仅为人民群众提供了“万众皆可创作”的实践可能性，也激发了人民群众对文艺工作新的需求和要求。历史地看，从延安文艺座谈会“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到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人民性始终是党领导文化建设的根本遵循。“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①]。也就是说，党对新大众文艺的领导是数智时代大众文艺生产过程中不断获取人民群众意见、想法的过程，是信息技术革命下实现党对文化建设的领导，进而满足广大人民内生文化需求的过程。

综上所述，新大众文艺背景下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本质上就是党在文化数字化生态下，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根本指导，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利用数字化、智能化等现代信息技术，在文艺创新发展全过程中展现的一种文化秩序维护力、文化创新引领力和文化战略推动力。

（二）新大众文艺背景下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的基本特征

新大众文艺是指在数字媒介环境下，依托人工智能、推荐算法、大数据等技术工具，以人民群众广泛参与为核心特征，实现文艺创作、传播、接受等全流程重构的文艺新形态[②]。在此背景下，党的文化领导权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特征。

一方面，党的文化领导权由重点领域转为全域覆盖。新大众文艺的核心在于全民参与技术驱动，文艺生产、传播、消费由精英主导的中心化单向传播转向全民参与的去中心化多向互动，促使党的文化领导范围发生了极大扩展。从领导对象来看，在“群众在哪儿，我们的领导干部就要到哪儿去”[③]的领导逻辑下，党对文艺工作对象的领导，从早期侧重于对“作家及艺人的各级组织”的领导，譬如，“领导作家及艺人的各级组织。审查电影、剧目和其他全国性的或地方性的重要艺术品”[④]，逐步形成了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人民共享的新领导格局。从领导范围来看，党的文化领导内容不仅涵盖了党的理论武装、意识形态建设、文化创新发展等传统领域，还进一步延伸到文化人才培养、文化传承发展、文化国际传播等多个层面[⑤]，呈现出系统集成、多点突破和全面纵深推进的特征。

另一方面，党的文化领导力运行结构发生数字化转向。媒介数智化作为新大众文艺的关键特征，其本质是新质生产力对文化艺术赋能的新形态。信息技术催生大众文艺数智化发展的同时，也使党的文化领导力向数字化转向。党的文化领导力运行结构展现出由现实空间迈向虚实融合的进阶历程。例如，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在文化治理领域的应用，使党在文化领域领导方式呈现出人机协同治理的数智化特征，即人工智能在文化治理领域的应用从早期的辅助性工具向人机协同共治范式转向，确立了技术赋能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深度耦合的文化领导样态。

三、新大众文艺背景下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的结构张力

新大众文艺的生态重塑不仅改变了党的领导在文化建设领域的运行逻辑，也带来深层次的结构性挑战。

①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10月15日第2版。

②陈怀平：《新大众文艺的数智特质、技术隐忧与人文复归》，《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2期。

③习近平：《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4月26日第2版。

④《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77页。

⑤蔡文成，刘富东：《新时代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的科学内涵、价值意蕴及实践路径》，《思想教育研究》，2024年第11期。

(一)文艺生产去中心化与思想引领力的张力

思想引领力作为党的文化领导权的灵魂与基石,是凝聚社会共识,实现党的文化意志与人民心声相统一的基础。以全民参与为特征的新大众文艺,使文艺生产呈现去中心化的叙事生产模式,弱化了党对文艺产品的思想引领力。

作为党的思想引领力的关键变量,文艺生产主体是壮大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关键力量,文艺产品的生产、传播与消费是党对文艺创作价值统摄的重要依托。据相关数据显示,我国网络文化从业者超3000万人,短视频用户突破10亿人,新大众文艺呈现出全民参与创作去中心化特征。相较于传统文艺生态,主流舆论信息往往由党所领导的权威媒体审查核实后发布传播。数智技术的介入重新定义了文艺产品的传播逻辑,使新大众文艺在技术赋能基础上,形成由智能算法、专业创作者、业余爱好者共同构成的协同共创共同体,在传播渠道上形成了由"渠道传输"向"算法驱动"的转型,是人人皆可创作、二创及共创的新型文化实践①。新大众文艺作为互联网时代文化活动的主要表现形式和思想交流形式,是意识形态工作阵地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当前文艺创作智能平台,是由少数文化资本和核心技术开发者集中控制和开发利用的,事实上形成了文艺内容生成与可见度垄断的局面。在此情景下,文艺媒介可供性决定了"谁在场内,谁在场外;谁可以说话,谁不可以;以及谁有权威且可以相信"②的话语格局,资本逻辑主导的传播环境对党的文艺引领力形成消解效应,加剧了主流价值凝聚的现实困境。

与此同时,新大众文艺的人机共创模式引发了全民内容共创与主流叙事间的内容张力。按照传统文艺创作流程,文艺创作依托中心化、科层化和专业化生产体制,通常由文艺工作者围绕国家叙事、时代精神与主流价值进行选题规划,主流意识形态通过文艺思想主体、人物塑造与情节逻辑展现出来。文艺创作要创作"真正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品"③。然而,在人机共创文艺生态中,深度伪造、风格迁移等"AI魔改"现象,打破了现实逻辑与既定叙事框架,衍生出荒诞、戏谑等低质的内容产品,并在数据驱动与算法生产的创衍模式下,不断冲击主流意识形态,弱化文化真实性,造成文艺版权争议与伦理隐忧④,与党领导文化凝聚人心的价值导向相悖离。

(二)文艺创作工具理性与文化创新力的张力

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是保持党的文化领导权生机与活力的重要驱动力,是繁荣发展新大众文艺的重要前提。但在以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主的文艺生产过程中,存在技术固有逻辑与文艺创新价值的张力。

一方面,效率优先的技术理性抑制了文艺原创能力的人文关怀。随着数字技术的迭代发展,文艺生产工具的数量更加丰富、类型更加多样,形式更加新颖,极大地拓宽了人们文艺创作的边界与体验。然而,数字技术作为一种媒介工具,其内嵌的工具理性逻辑天然指向文艺创作的效率优先,并非全面价值的考量,其最终必然将效率作为技术应用的核心评判标准。正如马克思所言,"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⑤。在数字技术融入艺术创作诸环节的过程中,数字技术的生成性功能虽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但"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⑥。具言之,在工具理性主导下,文艺工作者更加推崇创作手段和传播方式的创新,他们以提升文艺产品生

①陈怀平:《新大众文艺的数智特质、技术隐忧与人文复归》,《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2期。

②徐建飞:《新大众文艺发展的现实堵点及其纾解之策》,《江苏社会科学》,2026年第1期。

③《毛泽东文艺论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69页。

④参见吴布林,李佳艺:《技术封建主义主导下文化科技伦理挑战及防范策略》,《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https://link.cnki.net/urlid/50.1180.c.20251014.1826.008.,1-16,2026.04.10.网络首发。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776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76页。

产效率为目标，以流量、点击率和变现能力为导向，强调文艺生产目的的达成和效用程度，从而容易忽视文艺创作对内容独特性、严谨性的核心要求，这就导致文艺创新目标功利化、创作内容同质化、创作主体工具化，文艺创新呈现出形式繁荣而内核匮乏的结构性矛盾，这与党的价值引领、精神塑造、原创精品等目标相冲突。

另一方面，算法主导的文艺生产逻辑冲击了文艺话语创新，重塑着党领导文艺创新创造的实践基础。在传统文艺生产中，文艺创作是由作家、艺术家等专业群体，根据其自身深厚的艺术素养、精湛的创作能力和个性的表达方式，依托报刊、电视、线下展演等特定物质载体进行创作和呈现。新大众文艺作为以数字平台为载体的文艺数字化形态，其文艺产品的生产、传播及接受环节均发生改变，文艺作品的题材类型、叙事节奏、矛盾冲突等内容都将由算法逻辑进行创作、分发与反馈。随着数智技术的普及与智能终端的下沉，虽然普通大众能够利用微信、微博、B站等社交媒体平台进行自我表达和艺术呈现，但以草根创作者为主体的数字弱势群体却在算法逻辑中面临数据资源匮乏、话语权弱等困境，影响了党领导大众进行文艺创新实践。作为协助大众进行文艺生产创新的技术手段，在特定因素影响下可能转化为文化权力的载体，影响文艺创作话语导向[①]，阻滞文艺创作的独特性和生命性。

（三）文艺传播情境散点化与国际传播力的张力

国际传播力是衡量党的文化领导权的重要外部维度，是指国家通过多样化的传播手段与载体，在全球文明对话中掌握话语权与主动权的能力[②]。作为文化传播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大众文艺散点化传播情境与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要求之间存在一定差距。

数字技术在文艺领域的深度嵌入，促使文艺传播生态发生了系统性变革，其数智化、大众化、网络化等特点，对国际话语权重塑、中国形象树立等带来了一系列亟待解决的挑战。从传播主体来看，新大众文艺的国际传播实践，虽呈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也因传播主体大众化、“草根化”隐含着话语主权让渡的风险[③]。具体表现为，各行各业普通群众在利用互联网平台对诗歌、小说、散文等创作传播时，其在“流量至上”“短平快”“低门槛”等特性诉求的影响下，对文艺历史意蕴、国家重大叙事、政策说明等错误解读和片面理解，削弱了中国话语的深度、可信度与全球引领力。从传播渠道来看，网络社交媒体、直播平台、网络视听平台、游戏平台等不同形式的文艺传播平台，使传播效果呈现散点化、碎片化的特点。而虚拟化的传播情境加深了对文艺价值本真体验的冲突，其以虚拟叙事方式为主的对话体系，不仅弱化了人与人之间的思想文化交流，更在文化转译过程中造成文化折扣、文化误解、文化偏见等困境。从领导渠道来看，一方面，部分领导干部参与意愿不强，存在认知偏差，认为国际传播应是专业媒体或宣传部门的职责[④]；另一方面，党对文艺产品对外宣传的战略规划与政策引导统一性较弱，致使不同文艺主体在生产传播过程中分散无序。由此可见，新大众文艺背景下文艺产品传播模式仍需进一步改善。

（四）文艺生态商业化逻辑与风险防控力的张力

处理好文化安全与文化发展之间的关系是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的重要任务。“提升信息化条件下文化领域治理能力，在思想上、精神上、文化上筑牢党的执政基础和群众基础”[⑤]是党在文化治理领域的重要遵循。新大众文艺的快速兴起，拓宽了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发展空间，文艺产品的商

①王光东，汪一辰：《新大众文艺的一种形态及其反思——以短视频为中心的分析》，《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5期。

②苏玉波，董育余：《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的深刻意涵与实践路向》，《学习与实践》，2026年第2期。

③沈霄，谢志超：《新大众文艺背景下国际传播的范式变革与路径创新》，《中国编辑》，2025年第12期。

④庞宇：《新时代提升领导干部国际传播能力的四个维度》，《领导科学》，2026年第1期。

⑤《锚定建成文化强国战略目标 不断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人民日报》，2024年10月29日第1版。

业生产逻辑与文化风险防御治理之间形成新的张力。

从文化安全层面看,“流量至上”的商业模式给技术殖民与文化霸权带来更隐蔽的渗透方式,对党在国家文化安全方面的引领带来新的挑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世界上各种文化之争,本质上都是价值观念之争,也是人心之争、意识形态之争”①。一方面,文化消费逻辑侵蚀了新大众文艺的文化主体性。在资本增殖逻辑主导下,人工智能内容生成技术与资本社会文化权力高度关联,其艺术生产实践不仅是一种基于文化数据的技术操作,更是一场交织着算法机制、资本增殖逻辑和价值审美的复杂协商,文艺作品被赋予兼具意识形态属性与商品属性的双重性质。在智能媒介的加持下,新大众文艺能够深度融入各类文艺商业模式,如微短剧、直播打赏、衍生IP开发等,并在文化消费主义裹挟下,沦为流量与资本的附庸,导致过度市场化的文艺开发和千篇一律的文艺产品泛滥,解构了中华文化主体性和本土文化特质。例如,民间文艺为适配短视频、微短剧、直播平台等盈利模式,通常将传统文艺中的戏曲、民俗、民乐等本土化元素简化为商业化视觉符号或流量噱头,文艺本身所承载的民族记忆、精神内涵、地域习俗等文化价值被剥离,成为快速消费的形式外壳,稀释了民族文化本土性。另一方面,新大众文艺以全民参与的创作特性使文化殖民更加隐秘和广泛,其在市场机制和增殖逻辑的全面渗透下,更加依附平台经济和全球消费模式。在全球通用的50亿大模型数据训练集里,中文语料占比仅为1.3%②。此时,新大众文艺将被迫嵌入由西方开源框架主导的算法平台,并形成“话语权弱化—西方‘普世价值’嵌入”的连锁反应,使文艺产品异化为全球话语博弈载体,导致我国文艺产品在价值解释权博弈中陷入被动境地。

从文化伦理层面看,工业程序化的商业模式弱化了人民文化自主判断和感知能力。一是商业资本的大量注入推动新大众文艺生产标准化、规模化,出现批量化、低质量、脸谱化的文艺产品。在刺激重复出现和时间越长——审美感和新奇性越低的逻辑下,人们将弱化文化思考和文化判断力。二是商品逻辑中的新大众文艺产品,往往被赋予某种虚拟情感价值,使人们与其产生虚拟情感联结。在这种情感下,人与人之间的现实交往将被弱化,不利于各民族间交流交往交融③。三是由技术赋能文艺创作诸环节的创作模式,改变的不仅是文艺的内容、形式及生产传播机制,更改变了文艺和人的基本关系,对文艺产品权益关系造成了深刻变化,其在以算法逻辑为核心的新型商业模式中,文艺的商业价值被过度强调,文艺本身的价值底蕴在短期快速变现的诉求下被不断弱化,造成文化价值认同失真、文化版权纠纷、内容安全隐患等风险。

四、新大众文艺背景下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的能力调适

“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④。全球科技革命和文化产业变革的浪潮催生了文艺生态的深刻变革,对党在文艺领域的领导提出了全新的能力诉求。

(一)培养价值主体,确立价值融入文艺生产的系统化生产体系

为适应新大众文艺生产主体多元化叙事格局,需建立具有常态化、生活化、全过程嵌入的文艺评价与教育体系,系统嵌入专业力量,以价值引领文艺创作,塑造导向正确、持续向好的主流价值创作格局。

---

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105页。

②罗云鹏:《大模型发展亟需高质量“教材”相伴》,《科技日报》,2024年1月15日第6版。

③张家维,张海防:《人工智能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伦理挑战与破解路径》,《民族教育研究》,2026年第1期。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44页。

首先，要将文艺价值教育贯穿领导干部成长全周期。应将文艺战略教育和理想信念教育置于文艺领导工作核心环节，引导各级领导干部正确认识文艺工作对党和国家发展前途命运的战略意义，破除“宣传工作由专业部门引领”观念。一方面，坚持以理想信念教育作为党领导加强文艺领域生产创新和价值引领的重要载体和有力抓手。通过教育引导、文化熏陶、实践养成等多种途径，培养各级干部正确处理文艺工作与国家发展之间关系的能力，以党的文化创新理论引领教育人民。另一方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通过构建坚定文艺使命的内在精神场域，警惕功利化、绩效主义、文化浪费等错误观念。要将新大众文艺背景下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纳入干部成长重要内容与考核标准，成为实现党员干部价值自觉与引领文艺工作未来的核心动力。

其次，扎根中华文化主体性，夯实文艺生产体系的价值根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文化自信就有了根本依托，中国共产党就有了引领时代的强大文化力量”[①]。要想提升党的价值引领力，必须坚守文艺创新的文化主体性。应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过系统提炼与价值转化，赋予文艺建设思路、文艺表达话语、文艺创作机制等鲜明的时代特色与精神底蕴，为文艺主体创作提供生产方向。应依靠文艺实践活动打造具有持续性、灵活性、生成性的文化价值空间，引导相关部门及人民群众立足社会空间进行文艺实践活动，并基于各地区独特资源禀赋，凸显文艺产品的主体性历史特征。

最后，探索系统化文艺价值引领模式。文化领导权要在引导人民群众积极参与的过程中不断获取他们的同意、认同。这就要求党在领导文化建设过程中积极发挥人民群众合力，顺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对此，应积极探索多层级、多领域协同引领模式，以统筹调度文艺主题的方式，夯实文艺创作价值根基。在横向上突破基层文艺党组织领导过程中碎片化、封闭化、固化等弊端，形成思想一体的组织架构；在纵向上理顺组织关系，将因新大众文艺形成的新的组织架构与地方各级党组织有机衔接，形成灵活开放的思想引领体系。

（二）适配数字媒介，筑牢文艺工作高质量发展的人才支撑体系

为提升文艺创新创造力，推动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繁荣发展。应搭建专业化、规范化、系统性大众文艺创新平台，在激发全民族创新创造活力框架下，弥合文艺生产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张力，以此克服党在引领文艺创作过程中的现实掣肘。

首先，要培养领导干部数字文艺素养的复合高阶性。“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根本保证”[②]，新大众文艺背景下，对中国共产党文艺领导工作的能力提出新的要求，即相关领域党员干部不仅应具备对数字技术的熟练操作的能力，更应具备运用数字技术进行文艺工作创新发展的综合能力，即党在数字媒介深度嵌入文艺实践背景下，既能领导发挥数字媒介的文艺创作优势，又能防范化解异化风险的辩证统一能力。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不仅要具备运用数字媒介提升文艺工作效率、辅助创作分析、实现个性化创作等方面的创新价值的能力，更要具备发掘技术所蕴含的潜在的其他力量并对其进行转化的能力。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应具有高度警觉能力，具备抵御技术自身固有逻辑对文艺目的的遮蔽，防范因技术逻辑导致的伦理风险与社会现实挑战。

其次，建立健全全覆盖数字文艺公共服务，释放人民群众创新创造活力。“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③]。《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作出“中华文化

①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9页。

②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第5页。

③《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人民日报》，2025年10月29日第1版。

全景呈现,中华文化数字化成果全民共享”[①]的战略目标。新大众文艺作为以全民共创为特征的公共文化产品,必须坚持以社会价值为首要原则,紧密围绕人民群众对文艺创作的需要进行文艺资源分配,完善覆盖全人群的文艺创作服务体系,根据不同地区文艺发展状况与特点,针对大众文艺的“数字创作负担”问题,构建动态调整资源调配机制,提高人民群众数字文化生态适应性,激发全民族文艺创作参与度与积极性。

最后,把投资于人作为文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建议》提出,“要将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强调要“实施积极的文化经济政策”[②]。在文化领域,针对这一要求,要思考好和解决好“投资于人”投向哪里?采取什么模式?一方面,要细化新大众文艺专项扶持项目,搭建互联互通的文艺创作平台。应适应大众文艺创作“大众写、大众享”的创作趋势,凝聚最广泛文艺创新创造力,以政府专项扶持与企业融资相结合模式,搭建各级文艺院团、企业产业园、草根创作者等多元主体文艺共创平台,加强专业力量与民间艺术的交流协作,努力克服因数字技术固有逻辑带来的创作弊端。另一方面,党应领导制定非专业艺术人才评定制度,建立权威性文艺创作学习指引和展示平台,夯实文艺创新价值根基[③]。

(三)拓宽战略视野,搭建文艺叙事生态共生化的文化传播体系

“将艺术生命同国家命运、民族命运、人民愿望紧密结合……把文艺创造写到民族复兴的历史上、写在人民奋斗的征程中”[④]是文艺工作的历史使命与责任担当。面对文艺叙事分散化对党的叙事和传播能力的影响,应搭建文艺叙事生态共生化的文化传播体系,即以党的领导为根本、以国家议题为价值锚点,形成载体互通、主体协同、价值贯通的系统化传播格局,促进文艺成为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与话语权的重要载体和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引擎。

一是探索线上线下联动传播模式,延展新大众文艺温度与深度。新大众文艺不仅是文艺作品的线上延展,更是线下群众的沉浸式体验。在发展新大众文艺线上传播的同时,不能忽视线下观众的文化体验。要构建党委领导、部门协同、公众参与的传播共同体,推动新大众文艺深入日常生活、走向国际。譬如,中国文联通过举办“新大众文艺的‘在场’力量”活动,以“短视频+场景讲述+文艺节目”的形式,将鲜活时代场景转化为文艺叙事,生动呈现了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理想生活。要重视优质文化资源的公共文化场域下沉与推广,实现新大众文艺生活化、全方位、多角度传播。

二是搭建常态化、网络化、多元化的全球文艺交流平台。其一,要积极发挥主流媒体的引领作用。要充分利用主流媒体内容生产的权威性和报道能力,广泛宣传新大众文艺相关政策策略,为广大群众提供权威、准确的创作传播信息,加大主流媒体对新大众文艺产品宣传推广力度。其二,要强化数智技术对文艺产品传播的深度和广度。要推动传统文艺数字化转型,以适应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传播的特点与需求。针对文博、戏剧、出版等传统文艺业态,要加快搭建“人工智能+文艺产业”数字化平台,借助数字叙事场景和实践应用场景,延伸和拓展文艺产品传播广度和深度[⑤]。加快建设网络文学、网络游戏、网络影视剧等文艺数字化海外示范性场景落地,推动中华文化IP持续“出圈”,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与“引进来”相结合。

三是锚定全球发展议题,明确党领导文艺传播内容的方向。互联网条件下的新大众文艺,早已

---

①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https://www.gov.cn/zhengce/2022-05/22/content_5691759.htm,2026.03.22.

②《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人民日报》,2025年10月29日第1版。

③王丽:《两会关注丨新大众文艺:人人是主角,时代共呼唤》,https://www.cflac.org.cn/hd/202603/t20260312_1361435.html,2026.03.12.

④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12月15日第002版。

⑤吴布林,刘昱琪,武斌:《数字叙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动因、图景与进路》,《民族教育研究》,2025年第2期。

跨越国家、民族界限，成为全球文化公共产品，承载着全人类共同价值追求。马克思曾指明，“凡是利用和平宣传能更快更可靠地达到这一目的的地方，举行起义就是不明智的”[①]。这意味着，党在领导文艺创新创造时，应引导文艺工作者将中国文化元素、政治宗旨、经济符号转化为文艺创作的精神符号，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好声音，使文艺作品的生产传播始终围绕国家发展的战略需求加以展开。

（四）推动协同共治，加快构建以负责任为核心的文艺产业生态

《建议》提出要“提升信息化条件下文化领域治理能力”[②]。针对新大众文艺背景下内容生产模板化、套路化、猎奇化等问题，调适的核心在于将解放文化生产力与文化安全治理相统一，培育负责任的文艺产业生态圈，推动文艺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③]。针对当前党在文艺领域面临的文化安全问题，要加快建设负责任的文艺产业生态圈，抵制新大众文艺过度商业化倾向。相关部门应牵头培育一批以新时代企业家精神为引领、自主研发能力过硬、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可持续发展的文艺产业。一是要进一步优化文艺产业发展规划，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相关部门要积极以更加健全的文艺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更加完善的文艺产业结构布局，更加合理的奖惩制度，为繁荣发展新大众文艺奠定坚实基础。二是要建立常态化审核机制，对涉及重大议题的传播内容进行分级分类审查，加强文艺娱乐化治理，对文艺创作活动中出现的过度娱乐化、意识形态偏差、庸俗化等问题进行针对性整治，确保新大众文艺在党的领导下始终坚持正确方向。三是要加快研究文艺产业的立法工作，强化新大众文艺高质量发展的制度保障。当前，国家在文化领域体系化方面的政策措施仍处于探索阶段，国家层面的“文艺产业促进法”依然缺乏。对此，相关部门应加快探索聚焦文艺产业发展的法律法规，健全文艺领域知识产权保护等相关立法工作，为文艺行业健康有序发展提供坚实法律依据。四是引导文艺生产工具健康向善发展。针对新大众文艺生产创作的技术风险因素，必须将“科技向善发展”确立为AI文艺生成的核心标准，探索文艺与科技融合的有效机制。一方面，要加强重点领域科技研发，突破文化霸权。科研院所、高校、文艺产业等相关部门要联合攻关，加快突破文艺领域“卡脖子”应用技术，建立文艺高质量发展的技术支撑系统。另一方面，应构建数字环境下新大众文艺健康评价体系。为适应数字化条件下文艺创新发展，相关部门应聚焦价值引领、市场指标、AI素养等为核心的新型评价体系，确保文艺生产创作始终符合党和国家的战略需要。

［责任编辑：郑　毅］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90页。

②《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人民日报》，2025年10月29日第1版。

③《二十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568页。